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DOI:10.15986/j.1008-7192.2023.06.008

#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关切：“原则高度”与实践智慧

黄雨晴,陈良斌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89)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生态理念的系统创新和范式转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定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式转换,“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治理逻辑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发展,同时,借助新时代十年来生态实践智慧的广泛总结与全面贯彻,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从而在历史性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将马克思“原则高度”的革命转化为现实的生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现实镜鉴,为推动构建全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有效助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原则高度”;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D61;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6-0056-07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实践创新史。在总结回顾历史经验,尤其是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含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24</sup>。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将生态价值关切贯穿整个现代化建设,有效回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真正实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发展。

##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价值关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同志在把握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对全球形势与国际格局所做出的精准研判。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还未消散,猴痘感染又开始席卷欧美,欧洲又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的禽流感,全球公共卫生防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同样不容乐观的是,自21世纪以来,

《原子科学家公报》首次将全球变暖的危险与核威胁并列,气候变迁屡次推动“末日时钟”走向今日。近年来干旱、洪水、山火以及全球性极端高温现象频发,学者警示的气候危机纪元已成山雨欲来之势。有学者甚至指出,通过影响全人类的生存环境,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已然成为这个百年最具影响的大变局<sup>[2]10</sup>。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我们需要看到无论是以病毒疫情面目、还是以极端气候态势出现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系统性爆发。对此,福斯特就认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sup>[3]6</sup>。进一步而言,今日生态危机的频繁爆发,源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不断固化的社会结构,以及其所推动的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它以资本积累和扩张为绝对命令,直接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剧。

回溯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资本通过克服“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跃迁,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即“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sup>[4]390</sup>。

收稿日期:2023-09-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20BKSI185)

作者简介:黄雨晴(1998-),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陈良斌(1981-),男,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承认理论、空间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1562387191@qq.com

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5]714</sup>。归根到底,这种资本与大工业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铁律。这就意味着,为了推进现代化,资本势必通过“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sup>[4]389</sup>的方式来维持其生产的无限性;同时,在逐利最大化的驱使下,这种非自然的、反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对自然的掠夺推到极致,不断突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界限,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错位。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的工具主义自然观、消费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自然不可避免地将其文明成果的取得建立在惨痛的生态危机之上。具体来说,作为“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sup>[4]389</sup>,自然科学对理性的绝对推崇把自然置于可控制、可量化、可还原的客体地位,经济理性和技术的使用把自然当成了人类予取予夺的资源,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此外,谋求“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sup>[4]389</sup>的过度生产,别有用心地为人类社会呈现了丰盛的物的形式,诱生出大量占有商品符号价值的过度消费。为追求利润而生产的大量“非生活必需品”,不仅增加了资源消耗,还利用“由增长来医治增长的顺势疗法”<sup>[6]20</sup>吸收、吞噬其蓄意制造的环境污染,甚至借助全球商品链体系把生态问题当作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借以产业转移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空间扩张,不仅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掠夺,还以转移污染和逃避责任的不作为给全世界带来了系统性生态灾难。

西方加速现代化以来所产生的一连串生态问题佐证了马克思的前瞻性判断:资本主义生产在发挥“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本身具有内反性的一面,“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sup>[7]471</sup>。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西方既成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暂时性、冲突性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揭示了以西方世界为价值标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局限性。在资本逻辑推进世界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逆生态性,警示着人类需要对现代化道路以及工业文明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从而印证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绝不是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准模板。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既是创新发展的智慧,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更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当代诠释。回顾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当中,书写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相较于服务于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未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守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而持续奋斗。这种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叙事框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造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实践带来了文明形态的变革和深化,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

之所以称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鲜明的特色就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形态所蕴含的生态价值关切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据<sup>[8]46</sup>,有效扬弃了资本为本位的工业文明,孕育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成果。毫无疑问的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背后隐匿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于是,由此生发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不仅蕴含着对自然的征服和剥削,还人为地降格为“自身的出卖者”,因为资本统摄下“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sup>[4]267</sup>。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佐以“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克服了对自然的片面化认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式发展目标。从物的支配性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回归,标志着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以升维式的价值跃迁,跳出了资本的陷阱,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革新。

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协调了生产生活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生态和谐的全局观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生态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文明双向支撑的内在要素。这股由绿色文明引领、不同领域交汇共进的合力走出了西方社会内外撕裂、文明与价值观空洞乏力的困境,达到了顶层设计与底层构建相配套的全领域、整体性和谐,因而更具有真实性、吸引力和凝聚力。

##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及其“原则高度”

早在1843年,面对德国从相对落后状态开启现代化发展道路之际,马克思就曾发出了著名的“原则高度”之问:“德国能不能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将来要达到的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sup>[9]11</sup>较之于19世纪的德国,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即一方面如何将中国式现代化提高到英美发达国家的水准,另一方面如何展开人的“原则高度”的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扬弃与超越。对此,中国式现代化无疑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开创,尤其是以生态理念的系统创新和范式转换,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将马克思意义上“原则高度”的革命落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体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统筹把握超越了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对立、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割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价值理念。在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国家,追求物质财富变成了人类生产的唯一需求。就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sup>[10]45</sup>资本的本体定位清扫了其他一切有悖于获取财富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对生态环境存在状态的错误认知,因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高兹对资本的思维方式的揭露一针见血:“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sup>[11]19</sup>生态环境的工具化视野赋予了人类无节制的生产活动,以及对全球环境的系统侵占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因为在自然资源与人的供需关系问题上,“从生态角度看的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真正的来源”<sup>[12]51</sup>。不同

于西方“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对文明实质的遮蔽,中国自新时代以来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人类活动纳入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考量,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定位超越了西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模式,走出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双向促进路径,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的最优化。在充分认识生态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视经济与生态的关联性,在社会-自然的复合系统中把握经济增长的生态方向,打造了生态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sup>[13]362</sup>绿色经济新秩序是对环境友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模式,是对粗放型增长模式的革新,是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规范引导经济发展和环境目标、实现绿色GDP增益的科学途径。离开经济支撑的生态建设必然是徒劳无功,舍弃了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势必呈断崖走势。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道路。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式转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旨归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底层逻辑的根本性矫正,其人民性立场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式转换。历史上,资本曾是西方现代化国家超越传统社会的关键动力,创造了比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4]49</sup>这种内在规定下物欲支配主体、增殖支配生产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注定了资本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反噬。奥康纳在其成名作《自然的理由》中明确指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的、反城市规划的与反社会的。”<sup>[14]394</sup>事实也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掀起了人类对自然穷兵黩武的征服史,通过对自然的贪婪攫取,创造了一个时空压缩、异化消费、过度索取的对象化世界,人类在对拜物教的狂热中一再挑战生态容纳的极限,陶醉于人类降服自然界的胜利。最终,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破裂戳破了现代性的幻象。人类主体地

位的衰微,内在地掏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潜能。自然以大规模生态危机爆发的形式开启了对人类的反攻。显然,自然界无情的报复印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是人沦为资本操控对象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明形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张“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sup>[11]19</sup>,力求创造美好生活的绿色文明形态。须知生态环境的质量影响着人的生存状态,作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不可或缺的一环,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十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用务实之举,聚非常之力,行绿色之道,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守护好了蓝天碧水净土,打造了舒适健康的人居环境,在真抓实干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中国人民筑牢了美丽中国梦,谱写了绿色生活的新篇章。此外,绿色文明形态的人民性不仅体现为对当代人民生态需要的关照,还表现在注重代际关怀的长远谋划。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生态建设是一项千秋大业,“必须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让历史的春秋之笔为当代中国人留下正能量的记录”<sup>[15]148</sup>。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坚持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未来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生态资源。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体现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治理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sup>[11]11</sup>。“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治理逻辑的系统更新,充分展现出人与自然有机整体、现代化与生态化协同共进的思维方式转换,从根本上否定了竭泽而渔的短视,改变了利用自然方式的需求,以绿色变革来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而全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诞生的生态保护主义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生态保护主义运动以绿色意识的启蒙和诸多环保实验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反抗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如今,这场席卷西方并曾为全球生态做出贡献的运动已经面目全非,环保主义运动日益蜕变为激进的作秀,生态保护的实效成效寥寥。显然,就

理念变革和实践推进而言,生态保护主义运动的变革仍未跳出如何“再造自然才能使其适应利润的可持续性和资本积累的要求”<sup>[14]381</sup>的窠臼。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控制生产规模和限制消费欲望的角度就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并提出生产性正义的解决方案,并寄希望于“稳态经济”模式——生态理性、小规模生产和节制需要来实现环保的目的。然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缺乏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引和实际效果,仅停留在批判层面而非建构性的议题上,遑论触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核心。现实中,西方环保界对日本排放核污水集体失声、激进环保组织泼污名画、英法德带头放弃减排等等啼笑皆非的闹剧,无一不折射出资本主义环保方案的虚伪性。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世界“绿色新政”的频繁流产,是政客用绿色形象进行自我包装,或假以政治站队和街头运动的形式来敷衍民意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资本主义所谓“深绿浅绿”的方案有着天壤之别,“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治理逻辑体现了从源头上解决污染、整体提升环境质量的勇气和决心。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坚持以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以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全链条为重点,稳扎稳打,群策群力,持续深化实施“双碳”战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能源结构调整和污染企业达标排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渐进式引导生态消费,促进勤俭节约、节能降耗的生活方式与生态文明相适应,推动形成生态文明新风尚。另外,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制等法律法规的实施,牢固树立了生态责任治理的法治权威,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在实处。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创新体现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发展。面对既有的生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表现在用中国智慧推动国内发展与治理的革新,还展示出遵循文明发展的内生性诉求、用中国力量助力世界绿色发展、以多元协同的文明范式为引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守正创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鲜明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sup>[16]104</sup>。资本转移和资源掠夺的对抗性博弈成了当今西方现代化回应全球生态问题的唯一方案。但马克思同时也看到,

“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sup>[17]147</sup>。推诿责任的零和博弈体现的是发达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本国经济和生态双重富裕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排他性的外在表现,严重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生态对话和治理的世界行动。习近平同志站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一再强调生态之于人类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sup>[18]243</sup>须知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全球性生态灾难中独善其身,国与国之间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对话机制和治理方式。作为生态文明的样本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从马克思“原则高度”的角度出发,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发展为指针,为人类生存与世界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这一中国智慧是从“西方中心论”到“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变革,是建立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基础上对全球性交往的价值规约,有力地促进了文明之间的聚同化异、相向而行。面对环境问题地缘分布不均、治理能力悬殊、发展程度参差等现状,中国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引导全球生态危机治理的交流合作和责任分配,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并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加强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推动全球“生命共同体”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与世界历史意义

从文明范式的转变到实践举措的落地生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十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sup>[11]1</sup>,以生态环境质量的实质性提升证实了“文明是实践的事情”<sup>[19]536</sup>。美丽中国这十年的春华秋实离不开中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所开创和积累的丰富实践智慧——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环境污染的系统性修复和防治以及生态治理体制的建立健全。这是中国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而发出的时代强音。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表现为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源头和内生动力机制来看,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和无节制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是造成自然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相应地提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sup>[1]50</sup>。通过锚定“双碳”目标,我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坚持先立后破,推进能源体系低碳转型,用高科技和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高污染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升级。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居世界第一,清洁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并已成为全球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新时代十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用绿色消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低碳环保的理念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非凡成就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生活方式低碳化的双重变革。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表现为环境污染的系统性修复和防治。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sup>[13]358</sup>。十八大以来,面对自然界的风险挑战,党中央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开展整体筹划,从自然界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和整体关联入手,不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力度,在方法论的创新和治理实践中扩展自然环境生命共同体的边界,将荒漠化防治纳入总体关切,“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sup>[1]11</sup>。新时代十年,我国坚持系统性原则,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管控、保护、治理和修复工作,生态系统的生态涵养质量、循环能力和稳定性得到切实提升:草地沙化治理成效显著,优良的草原植物成为固碳、节水、抗旱的重要载体,区域、流域、海域的联防联控协同助力长江、黄河重要江河流域水质提升和环境修复,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生态保障。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表现为生态治理体制的建立健全。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护

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sup>[20]</sup><sup>13</sup> 新时代中国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充分发挥生态治理优势,取得非凡建设成就,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刚性约束。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制定修订法律和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指导方案,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新时代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显著: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通过加强资源集约循环利用,应对资源约束趋紧,保障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空间科学规划、污水资源化利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环境风险常态化管理体系得到完善,坚持贯彻底线思维,持续加强高风险领域的严格监管,着力强化安全意识,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妥善处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全过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用指标约束和责任追究夯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落地。

鉴于此,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的跃迁,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于一国之内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案的特殊性中还蕴含着“原则高度”的普遍性,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同时具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再次成功地在世界历史中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诞生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领域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优越性。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sup>[21]</sup><sup>8</sup>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霸权侵蚀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开创性成果,是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独特建设方式铲除生态危机的根源性病理<sup>[22]</sup><sup>53</sup>、在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工业文明版图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诚然,就此断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形态已经全面替代西方现代化文明仍然为时尚早,但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却为马克思意义上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想象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是中华民族拓展现代化途径的伟大创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现实镜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国情的基础上,带领中国在新时代征程中跳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向优的历史奇迹。这一“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驳斥了“普世价值”“文明终结”等错误论断,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和超越,是兼顾独立性与进步性的创造性成就。过去的历史已经证伪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标准道路,而今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生态文明现代化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为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中普遍存在的“发展与环保”的两难命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sup>[23]</sup><sup>12</sup>,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事实胜于雄辩的示范效应。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智慧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有效助力。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sup>[1]</sup><sup>23</sup>。须知生态危机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然物外、独善其身。因此,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新时代十年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在生态保护的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充分展现了中国推动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主张,从而为世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sup>[24]</sup><sup>553</sup>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社,2022.
- [2]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 [3] 约·贝·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李晶,董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 谭倩.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向度:科学理据、价值蕴含及其话语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23(7):46-54.77.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ANDRE G.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 New York: Verso,1989.
- [12]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M].彭殊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4]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5] 冯俊.中国治理新方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0]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1] 习近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努力开创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J].中国生态文明,2022(4):6-9.
- [22] 蔡华杰,陈俊翔.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5):49-55,202.
- [23] 兰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突破[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6(2):10-16.
- [2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Ecological Concern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Height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Wisdom

HUANG Yu-qing, CHEN Li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tes that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uld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nov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of ecological ideas——namely, the idea orientation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he value paradigm shift of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the logic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across the board, in all regions, and at all tim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lif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virtue of the extensive summary and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sdom of ecological practice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the new era, it has promoted historical, transitional and global changes in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formed the Marx’s revolution of “the height of principles” into a vivid reality in a sense of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which would provide a realistic mirror for the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n effective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life”.

**Key word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height of principles”; value implication

【编辑 吴晓利】